

十三经说略

王宁 褚斌杰 等著

中华书局

十三经说略

王宁 褚斌杰 等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三经说略/王宁,褚斌杰等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1
ISBN 978-7-101-10534-6

I. 十… II. ①王…②褚… III. 群经合辑 IV. Z1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53209 号



书 名 十三经说略
著 者 王 宁 褚斌杰等
责任编辑 孙永娟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
印 数 1-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534-6
定 价 36.00 元

再版序言

李学勤

《十三经说略》、《二十五史说略》由中华书局修订再版,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事。

两部书虽不厚,却是体大思精之作。对作为传统文化核心文献的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五史》(《二十四史》加《清史稿》)逐一介绍。执笔的二十几位学者,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,堪称一时之选。现有几位先生已经故去,令人不禁感叹,只能读其文而念其人。

全书各篇,既有系统的叙述,又有独到的见解,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,便利学人。对于这样的好书,我是不敢随意讲话的,所能说的,首先是我自己一定会仔细绎读,其次是向广大读书界竭诚推荐。

古代学者对经史一贯推重。不少人自立课程,规定“刚日读经,柔日读史”(古人用干支纪日,日干值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的为刚日,值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的为柔日),坚持多年不废。这表明经史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内容,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须掌握了解。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变革,今天我们的教育已有根本的改变,但是如果认识传统的历史文化,还不能不对经史有概要的理解。这两部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来设计的。

“经”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。“经”字的本义是布帛的经线,经线贯穿于整幅布帛之间,从而“经”引申而有常、本的意思。被尊为基本典籍,常相传

授的书,便叫做“经”。那些解释或发挥经义的,则称为“传”、“记”、“说”、“解”,后来还有“训”、“诂”、“注”、“笺”等名。

诸子作品也有称“经”的,如《墨子》有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,《管子》有《经言》和《解》,《韩非子》的《内储说》、《外储说》也有“经”。不过这些文献,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,真正称得上是“经”的,只有《六经》。

《六经》见于战国,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《庄子》的《天运》和《天下》、《商君书》的《农战》、《荀子》的《儒效》等篇都有记载。其中《天下篇》说:“《诗》以道志,《书》以道事,《礼》以道行,《乐》以道和,《易》以道阴阳,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,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”(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《经书浅谈》杨伯峻《导言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)可见《六经》不是儒家所特有。

曾有学者以为《庄子》等记述或系晚出,战国时的“乐”本来没有成文,质疑是否有《六经》存在。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名,次序与《庄子》等全然一致,这种怀疑便消除了。

秦火以后,《乐经》亡佚,汉朝只有《五经》立于学官。到唐代,《礼》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《春秋》有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,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,共为《十二经》。宋明又增添《孟子》,于是定型为《十三经》。宋代有人提到把《大戴礼记》收入,合为“十四经”,但没有成功。

经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,像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讲:“经禀圣裁,垂型万世,删定之旨,如日中天,无所容其赞述。”事实上,历代学者的注疏诠释,还是各抒己见,顺应时代的潮流,疑经、改经的事例也复不少,使经学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。无论怎样,经在历史上的影响十分重大,不了解经与经学,实不足与言中国学术文化的流变。

和《十三经》类似,《二十五史》的形成也有相当复杂的过程。据文献记载,唐朝试士,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为《三史》。北宋时刻书,增加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和《五代史》,称作《十七

史》。明代再加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，为《二十一史》。至清加以《明史》，称《二十二史》；武英殿本又有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，合成《二十四史》。民国时开明书店印行《二十五史》，是于《二十四史》外增收《新元史》一种。但在《清史稿》印行流布后，人们又逐渐将《清史稿》与《二十四史》合称《二十五史》，《新元史》慢慢就很少有人提到了。今天人们所言《二十五史》就是指《二十四史》加《清史稿》。

《二十五史》以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居首，然而中国修史的起源要更古远得多。我们看商代甲骨文已有“史”这一职官，又称“作册”，专司文书记述之事。西周史职分工更细，金文如史墙盘详叙国史，史惠鼎引据《诗》文，都可看出当时史官的博学。至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所载东周各国史官秉笔直书，不畏强权，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佳话。周代的史多为世袭，史墙一家即其明证。直到秦朝，法律仍然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去培养史的学室读书（参看李学勤《试说张家山简〈史律〉》，《文物》2002年第4期）。司马迁也是继承父业而任太史令的。此后公私修史，历代不绝，《二十五史》正是这一传统积累的主要成果。

在目录学上，《二十四史》称为“正史”。《四库总目》认为“正史体尊，义与经配”，广泛流行的《书目答问》也主张“事实先以正史为据”。这些正统的看法自然带有偏见，贬低了所谓“别史”、“杂史”等的作用。连四库馆臣也以《资治通鉴》编纂时兼收博采为例，承认各类史书并存的必要（《四库全书》研究所整理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）。不过《二十四史》中，有的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是不朽名作，就是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之类，也属集体撰修，取材宏富，规模恢远，仍为研究者所必读。

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五史》，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，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。《十三经说略》、《二十五史说略》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。

目 录

再版序言	李学勤	1
《周易》说略	郑万耕	1
《尚书》说略	刘起钊	22
《诗经》说略	褚斌杰	52
《三礼》说略	彭 林	82
《春秋》与《三传》说略	曹道衡	113
《论语》说略	孙钦善	150
《孟子》说略	董洪利	185
《孝经》说略	彭 林	211
《尔雅》说略	王 宁	226

《周易》说略

郑万耕

《周易》乃《十三经》之一，并居其首，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。其作为一部古老的典籍，最初是用于算卦的迷信之书，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，逐渐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。关于《周易》名称的意义，有三种解释：一是所谓“周”是指周朝，“易”为简易，《周易》即是周代人简易的算卦之书；二是“周”是周普的意思，“易”为变易、变化之义，《周易》乃探求普遍的变化法则之书；三是“周”即圆，《周易》就是研究循环变易的规律之书。多数学者认为，第一种解释比较符合原意。汉代人所说的《周易》，包括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两个部分，传是对经所做的解释。

一、《易经》的著作年代和作者

《易经》成于何时，作者何人，迄今仍无定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提出“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之说，认为伏羲开始画八卦；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，作卦爻辞；孔子作传以解经。东汉经师又提出周公旦作爻辞说。宋朝朱熹概括为“人更四圣”说。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新史学兴起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，认为卦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足证《易经》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因此出现了周初说、西周末说和战国说。

顾颉刚先生写有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一文，第一次从《易经》的卦爻

辞中的故事来考证《易经》的著作年代。其中有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的故事。顾氏指出,“康侯”即卫康叔,封于卫,乃武王之弟,称康叔,其事迹在武王之后,故卦辞非文王所作。而《易经》中没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,据此,《易经》当成于西周初叶。

郭沫若先生在《青铜时代》一书中,收有《〈周易〉之制作年代》一文,认为《易经》乃战国初期的作品。其证据是《周易》中有几个地方提到“中行”。他以为“中行”是人名,指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,在与楚国交战时统帅中军,又称“中行桓子”,其子孙以“中行”为氏。据此,认为《易经》不能早于春秋中叶;可能是孔子再传弟子馯臂子弓所作。其实,这种解释十分牵强。因为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(前672)就讲到“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,陈侯使筮之”的事情。这发生在荀林父做统帅八十多年以前,证明《易经》不是作于战国乃至春秋中叶,而在春秋初叶就存在了。《周易》中的“中行”二字,旧注解释为“中道”,是有理由的,并非人名。

李镜池先生在《周易探源》中,则折中以上两说,主西周末年说,认为《周易》之编著,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,成书于西周晚期。

总起来说,虽然说法不一,但多数学者认为,《周易》的基本素材是西周初年或前期的产物,其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,而是陆续形成的作品。我们倾向于周初说。

《易经》是怎样编成的?可能是当时掌管卜筮的人,于每次占卜之后,将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词句记录下来,到年终,又将积累的筮辞和卜辞加以统计、整理,看其有多少条已经应验。已经应验的则筛选出来,作为以后卜筮的参考或依据。经过无数次的筛选、编排和文字加工,最后形成了《易经》。近人认为,《易经》的编纂,出于周朝史官之手,也是可信的。

二、《易传》的著作年代和作者

过去传统的说法,认为《易传》是孔子所作。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即持此说,影响很深。直到北宋中期,欧阳修著《易童子问》,才开始怀疑《系辞》以下为孔子所作。理由是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,众说淆乱;所谓“子

曰”，乃讲师之言。南宋叶适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。清朝史学家崔述于《洙泗考信录》中，又作了更加详备的考辨，进而怀疑《彖》、《象》为孔子所作。近人通过研究，几乎一致认为，《易传》十篇确非孔子所作。这已成定论。但这十篇的作者究竟是谁，已无可考。多数学者认为，《易传》各篇非出一时一人之手，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《易》作品。但对各篇形成的年代，仍有不同意见。大的分歧有二：一是战国前期说，一是战国后期说。争论的焦点为《彖》、《象》和《系辞》的年代。

战国前期说以张岱年、高亨先生为代表。张先生根据战国末至前汉初期的著作中对《易传》的引述，以及哲学命题的立定和否定，基本范畴的提出和运用，来考定《易传》的著作年代。其结论是：“《易大传》的年代应在老子之后，庄子之前。”（张岱年《论〈易大传〉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》）“《系辞传》的若干章节，当成于梁惠王以前，即写成于战国前期。”（张岱年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》）“《彖传》应在荀子以前”，《文言》、《象传》“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。”（张岱年《论〈易大传〉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》）

战国后期说以冯友兰、朱伯崑先生为代表。朱先生于《易学哲学史》第一卷中，对《易传》形成的年代，主要从《易传》所提出的概念、范畴、命题、术语和学说，如太极、道德、性命、天尊地卑、时中说、顺天应人说、养贤说等，同战国时期的作品如《孟子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中庸》的联系进行考证。其结论是：“《彖》文当在《孟子》以后”，“孟子和荀子之间”；《象》出于《彖》之后，“《象》的下限，当在秦汉之际以前，同样可以看作是战国后期的作品”；《文言》多引《象》、《彖》文意，加以发挥，其“下限当在《吕氏春秋》以前”；“《系辞》的上限当在《彖》文和《庄子·大宗师》之后，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，其下限可断在战国末年”。考辨精详，比较有说服力。此不一一赘述。

三、《周易》经传的流传和演变

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材料看，《易经》作为占筮的依据，在春秋时期已经十分流行。据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记载，当时人以《周易》占问吉凶，共有二十余

条,且讲论《周易》的情况,涉及周、陈、晋、鲁、齐、秦、郑、卫等国,足证春秋时代《周易》流传之广泛。这说明,当时人已经把《周易》奉为神圣的典籍。

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孔子,对《周易》也颇有研究。司马迁说: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。”“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马王堆帛书《要》篇也有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,居则在席,行则在囊”之说。《论语》中有两处讲到《周易》,视其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典籍。《论语·子路》引述南人的话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”,解释恒卦九三爻辞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,强调卦爻辞道德修养的含义,认为善于学易的人,不必去占筮。《论语·述而》又说,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”,认为《周易》对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,予以高度评价。

西晋太康二年,在魏襄王(前318—前296)墓中出土了一批有关《周易》的著作,有《易经》二篇,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;《易繇》、《阴阳卦》二篇,与《周易》略同,爻辞则异;《卦下易经》一篇,似《说卦》而异。可以代表战国时期《周易》流传的情况。这说明,战国前期和中期,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解释《周易》。而以“阴阳”观念解说《周易》,似出于道家和阴阳家,因为儒家的代表人物,从孔子到孟子,乃至孔子的孙子子思,其著作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中,皆无阴阳说。

随着人们对《易经》的推崇和研究,陆续形成了一批系统解《易》的著作,即《易传》,使这部用于占筮的迷信之书,成为一部讲哲理的哲学著述。

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记载,自孔子授《易》,传承不断,六代而至汉初经师田何。由于统治者表彰儒家,提倡经学,《周易》被尊为《五经》之首。无论官方和民间,都有一大批经师和学者,以治《易》为己任,使人们对它的解说,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,即易学。田何传《易》于王同、周王孙、丁宽、服生,四人皆著《易传》数篇。王同又传授给杨何。丁宽传《易》于田王孙,田王孙又传给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,称为“施、孟、梁丘之学”。孟喜又传于焦延寿,焦的学生是京房,于是又产生了“京氏之学”。其易学敢于创新,独树一帜,不同于田何易学的传统,被视为“异党”。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易学属于今文经学系统,皆立于学官。此外,还有一个易学传授系统,以费直为代表。其以

《易传》解释经文,注重义理,无章句,被称为费氏易,属于古文经学系统,未立博士,乃民间易学。

后汉时期,范升传孟氏易,以授杨政,而陈元、郑众皆传费氏易,其后马融又授郑玄,郑玄作《易注》,荀爽又作《易传》,皆为费氏之学。自此,费氏之学大盛,而京氏之学遂衰。但传费氏易者,也都受了京房易学的影响,如郑玄解经,虽属古文经学的传统,但又精通今文经学,以注纬书而闻名。荀爽虽不大讲阴阳灾变,但亦主卦气说。继承费氏易学的传统,排斥京房易学影响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,成为义理派王弼易学的先导。

汉人解《易》的显著特点是注重象数,以阴阳奇偶之数 and 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《周易》,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。并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结合,以卦气说解释《周易》原理。汉代易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体例,如卦变、互体、纳甲、飞伏、爻辰等,以此解说卦爻辞的意义,非常烦琐。

三国时代,王弼开创易学新风。他注重义理,有意识地排斥取象、互体、卦变、纳甲等说,一扫汉易象数之学的烦琐解《易》学风,是易学史上一个重大变革。另一方面,又以老庄玄学观点解释卦爻辞,对《周易》原理的理解,抽象化、逻辑化了。其《周易注》只注解了《易经》上下篇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等传,而未及《系辞》传。后来,晋人韩康伯补注了《系辞》等传。唐孔颖达将此二注合在一起,收入《周易正义》中,成为玄学派易学的代表作。此后,王学大盛,而汉学渐衰。

宋朝讲《周易》同汉人和王弼又有不同。他们不再追求《周易》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考证,而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。追求《周易》中的哲理,将《周易》原理高度哲理化,是宋易各派的共同特征之一。张载的《易说》用气学的观点解释《周易》,根据《系辞》传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。邵雍继承道教易学的传统,著《皇极经世》,提出先天、后天之学。程颐依王弼易学作《程氏易传》,以理或天理为易学的最高范畴,成为宋代占统治地位的易学。朱熹又继承程传的传统,并吸收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的思想,作《周易本义》,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教科书。

元明两代,是宋易深入发展的时期。明朝颁布《周易大全》,意味着程朱

易学,特别是朱熹易学取得了统治地位。元明两代的象数之学提倡以图像解《易》,又形成了易图学,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。象数派易学还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,并形成了医易学派,成为易学发展的新特点。明清之际,方以智父子对以前的象数之学作了一次总结;而王夫之则从义理学派的角度,对宋明易学进行了总结,并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。

清朝人解《易》,一方面反对宋人的易学,另一方面也反对王弼派的易学,而要求恢复汉人解《易》的传统,注重文字训诂和考据。其代表人物是惠栋和张惠言。而焦循著《易学三书》,并不惟汉易是从,而是依汉人解《易》的精神,独辟蹊径,建立自己的体系。

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,人们对《周易》的研究也开创了新的局面:一反过去以传解经的传统,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,将《周易》经传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,分别进行研究,开拓了从哲学、史学、社会学、古文字学方面研究《周易》的新领域。

关于《周易》经传的传本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施、孟、梁丘三家讲解《周易》的本子都是十二篇。《周易》的经和传,是由经师分别传授的。又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和《三国志·魏志·高贵乡公纪》,汉代经师费直和郑玄为了便于查阅,使人“寻省易了”,开始以传附经,后传至王弼。现在通行本《周易》经分上下篇,《彖》、《象》及《文言》分系各卦经文之后,即是王弼的传本。孔颖达将王弼和韩康伯《易》注收集在一起,并为之作疏,称为《周易正义》,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,这是《周易》流传下来影响最大的版本。

朱熹用吕祖谦所定《古周易》本,经和传仍分为十二篇,撰为《周易本义》。后董楷撰《周易传义附录》,“以程子在前,遂割裂朱子之书,散附程传之后。沿及明永乐中,胡广等纂《周易大全》,亦仍其误。至成矩专刻《本义》,亦用程传之次序。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经部易类三)。《周易本义》是宋代以后通行本。

1973年,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,又有《周易》。帛书《周易》与通行本《周易》大不相同。六十四卦的卦名与通行本有很大差异,其排列次序与通行本完全不一样,其卦辞和爻辞也有出入。帛书《周易》中

又有《系辞》传,共约六千七百余字,较通行本为多。其中无“大衍之数”章,但包括通行本《说卦》的前三节,有两千余字为今本《系辞》所无。帛书《周易》没有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,但卷后抄有《二三子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、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诸篇,为通行本所没有。帛书《周易》抄写于汉文帝初年。这说明《周易》在汉初就有不同的写本,不仅是田何的传本。帛书《周易》是现存《周易》中最早的别本。

在中国古典文献中,关于《周易》经传的注释,历代有史可查的就有数百家,可谓浩如烟海。现在流传下来,影响大的有以下几种:

《周易注疏》 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,孔颖达正义,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《周易集解》 唐李鼎祚,《四库全书》本,清刻本,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
《程氏易传》 宋程颐,《二程全书》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,清刻本,中华书局《二程集》本。

《周易本义》 朱熹,《四库全书》本,清刻本。

《周易集注》 明来知德,虎林刻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《周易述》 清惠栋,《四库全书》本,清刻本,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《周易集解》 清孙星衍,清刻本,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
《周易古经今注》 高亨,中华书局刊本。

《周易大传今注》 高亨,齐鲁书社刊本。

四、《易经》的内容和性质

古书一般都由篇或章来构成,《周易》则不同,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。卦也相当于其他书的一篇或一章。《易经》整部书共由六十四卦组成,分为上下两篇,上篇三十卦,下篇三十四卦。这种分法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,因为从魏襄王墓中挖出的《易经》就分为两篇。

《易经》由六十四卦组成,六十四卦的内容包括卦象、卦名、卦辞和爻辞。卦象指卦的图像,由阳爻—和阴爻--两种符号(爻象)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,共六十四种图像。卦中六画的排列自下而上,用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表示序位,阳爻称九,阴爻称六,爻象共三百八十四。初、二、三爻为下卦,亦

称内卦；四、五、上爻为上卦，亦称外卦。这样的三画卦共有八种，分别叫做乾（卦形是☰）、坤（卦形是☷）、震（卦形是☳）、巽（卦形是☴）、坎（卦形是☵）、离（卦形是☲）、艮（卦形是☶）、兑（卦形是☱），称为八经卦。八经卦两两相重，便构成六十四别卦。解说一卦的基本内容的词句为卦辞，系于卦象之下；卦辞起初被称为“彖辞”，唐以后改称卦辞，更加通俗易懂。说明每一爻的性质和内容的词句称为爻辞，列于卦辞之后。例如《易经》的第一卦，☰为卦象，其卦名为《乾》，卦辞为“元亨，利贞”。六画皆为阳爻，均称九，下第一画为初九，爻辞为“潜龙勿用”；第二画为九二，爻辞为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；余为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，各爻皆系有爻辞。卦辞共六十四条，爻辞三百八十四条，加上《乾卦》“用九”，《坤卦》“用六”，总称为筮辞，共四百五十条。

就卦辞和爻辞的内容说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。20世纪20、3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，就从文句体例、社会史和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过探讨。例如高亨、李镜池先生就将卦爻辞归纳为：记事之辞、取象之辞、说事之辞、占断之辞四类；郭沫若、李镜池、闻一多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卦爻辞的内容，又将卦爻辞区分为物质生活、社会生活、科技知识三类。

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卦爻辞的内容进行分析，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：

第一，讲自然现象的变化，用来比拟人事。如《大过》卦九五爻辞说：“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誉。”《渐》卦九五爻辞说：“鸿渐于陵，妇三岁不孕，终莫之胜，吉。”《离》卦九三爻辞说：“日昃之离，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，凶。”尤其是《乾》卦爻辞，更以龙象的变化来表现人的政治生涯的起伏升降。这些比喻，都是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，试图在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，或借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明人事活动的规则。这是认为，天道与人道具有一致性，对于以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说的形成，起了很大影响。

第二，讲人事的得失可以转化。《周易》卦爻辞涉及到许多对立的事物，如泰否、损益、既济未济、大人小人、夫妇、吉凶、往来、得丧等。难能可贵的

是,《易经》认为,这些对立面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例如《泰》卦九三爻辞说: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。艰贞无咎。”平陂、往复是两对对立面,但它们之间都可以转化,平的会变成陂的,往可以变成复。因此,虽处于艰难不利之境,也可以无咎。又如《乾》卦九五爻辞为“飞龙在天”,上九爻辞为“亢龙有悔”。这是以《乾》之第五画为龙飞的极限,认为超过此极限,至第六画就要走下坡路,即向反面转化,亦即后来所说的“物极则反”。因为吉凶、得失可以转化,所以通过人的努力,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,如《乾》卦九三爻辞所说:“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,厉无咎。”这种认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转化的观念,在卜辞中是没有的。

第三,提出了某些行为准则,对人有劝诫之意。有些卦爻辞不仅示人以吉凶,同时予人以教训,令人的行为按某种规范而行动。如《谦》卦卦辞说:“谦:亨,君子有终。”初六爻辞说:“谦谦君子,用涉大川,吉。”强调人有谦卑的品德,则可以取得好的结果。又如《恒》卦六五爻辞说:“恒其德,贞;妇人吉,夫子凶。”认为做妻子的德行有恒,遇事吉利;做丈夫的恒守其德,不能随时应变,当机立断,遇事则凶。又如《益》卦九五爻辞说:“有孚惠心,勿问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”对人诚信,有慈惠之心,自然吉利,因为别人也以慈惠之心待我。所有这些,都强调凶吉悔吝是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的。这种认为人事吉凶对人有劝诫之意,突出所占问之事的道德教训的意义的思想,也是卜辞所不可比拟的。

以上三点说明,《易经》卦爻辞中,含有某些逻辑思维,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,对后来易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。《周易》被认为是讲天人之道即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,被认为是讲事物变易法则的学问,被认为是讲人生修养的典籍,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。但是,从卦爻辞总的内容看,它仍然是用于占筮的典籍,并不是哲学著作。

关于《易经》一书的性质,从古到今,历来有着不同的说法,主要有两种意见。一是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义理之书,即主要是讲天道和人事教训的著作。这种认识从战国时期的《易传》就开始了。如《系辞》所说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原始要终,以为质也。”又说: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。”认为《易经》广

大悉备,天道、地道、人道,无所不包,乃“穷理尽性”之书。后来,无论是象数学派,还是义理学派,都有把《易经》一书哲理化的倾向。这种情况,直到朱熹那里,才有了根本的改变。他反复强调,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”,“《易》本为卜筮而作”,认为《易经》原本是周朝人用来占筮的典籍,不是讲哲理的著作,赋予其哲理的解释,是孔子《易》即《易传》的任务。此说颇有眼力,难以反驳。因为他依据先秦文献,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周礼》等有关记载,作了详细论证。这也就是历史上关于《易经》性质的第二种主要看法。当然,《易经》虽为卜筮之书,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生活智慧,正如前面所说。这也是《易经》一书逐渐摆脱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,能够不断被哲理化的根据所在。

五、《易传》的内容和特点

《易传》是战国以来儒家学者系统解释《易经》的著作,共七种十篇,包括《彖》上、下,《象》上、下,《文言》,《系辞》上、下,《说卦》,《序卦》,《杂卦》。《易纬·乾凿度》称为《十翼》,言其为《易经》之羽翼,有辅助之意,表示是用来解释《易经》的。汉代学者称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为“传”,《十翼》一类的著作也被称为《易传》。有时,汉代经师也将自己解释《周易》的作品称为《易传》。东汉经师为了区别所谓孔子所作的《易传》和一般经师的著述,取《易纬》之说,称战国以来的解《易》的著作为《十翼》。

有一种意见,以为《十翼》在汉初并不称为《易传》,而依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所说,称之为《易大传》。其实,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已经明确地称孔子所作为《易传》。汉初许多著作,如陆贾《新语》引《系辞》文,《淮南子》引《序卦》文,《春秋繁露》引《文言》文,《礼记》引《象》传文,皆称“《易》曰”。《韩诗外传》引《系辞》文,则称“《传》曰”。足证汉朝初年已经称《十翼》之类的著作为《易传》或《传》了。而《易大传》之称在汉初文献中仅此一见。据此,将《十翼》统称之为《易大传》,缺乏足够的说服力。据宋人欧阳修在《易童子问》中考证,《易大传》是指《系辞》而言。因为此传乃通论《周易》之大义,不是如《彖》、《象》那样,逐句解释经文的著作,所以又称之为《易大传》。(朱伯崑《易学哲学史》)